

我的女教師

舒 羣 著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我的女教師

舒 羣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編號：4092

我的女教師

著 者： 舒 羣

出版者：遼寧人民出版社
(瀋陽市馬路灣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印刷者：瀋陽新華印刷廠

字數：54,000

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版

印數：1—12,089

一九五四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所選入的八篇文章，是作者自童年到現在，在每個歷史階段所親身感受的中蘇友誼實錄。

這裏描寫了熱愛中國孩子的蘇聯女教師、關懷中國年青地下工作者的蘇聯母女倆、幫助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專家等人物。他們都是列寧、斯大林教養下的新型的人，他們都具有着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崇高品質。

本書，生動地告訴了我們：幾十年來，年代在變，環境在變，但偉大而無私的中蘇友誼，却永也不變，且愈來愈鞏固、加深。

定價：3,500元

目 錄

我的女教師·····	一
童話·····	一五
一夜·····	二五
歌謠和口供·····	三四
我所見的紅軍·····	五
阿·米·馬爾欽柯專家·····	五七
斯大林獎金獲得者·····	六
總顧問·····	六

我的女教師

(爲歡慶中蘇友好新條約和新協定而寫)

我的父母，憑着勞動，供我幾年書。高小畢業以後，同學們，升學的升學了，下鄉的下鄉了，做買賣的做買賣了。「我呢，往哪去？」我記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一九二七年，我十五歲，已經完全感到了這個人生的大問題。

我跑到哈爾濱，考進第一中學，因爲沒有學費退了學，又回到一面坡。我跑到小鋪子，人家用不着多餘的小伙計；大買賣家，沒有鋪保，也進不去。沒辦法，我拿定主意，去當學徒，學會手藝，就能養家糊口。誰想到，我這一個人當了兩個徒弟，因爲，一家鋪面開了兩個鋪子：一個石印所，一個紫彩鋪；他們兩家合夥收了我一個徒弟；說句實話，就是他們兩家合夥僱了我一個勞動力。從早到晚，上街跑腿，在家打雜，我什麼也學不到。紫彩鋪掌櫃的，脾氣還好，可是，我學這個幹什麼呢？難道我就爲死人要

一輩子手藝？石印所男掌櫃的，倒好說話；那個女掌櫃的，簡直是個母夜叉。她那一對眼睛，好似兩根釘子似的，釘在我的背上，不但不讓我閒，而且，打我、罵我。我看透了她的心，一天，趁她冷不防的時候，踢了她一脚，而後跑掉了。「我往哪去？」我不願意想，但又不能不想；想吧，越想越糊塗。

於是，我參加了野孩子羣，東闖西撞，胡打亂鬧，過了今天，再不想明天了。想不到，在這個時機裏，我認識一個朝鮮孩子，成了好朋友。

他是中東鐵路（今稱中長鐵路）蘇聯子弟第十一中學的學生，名字叫做果里。聽到我的苦處，他同情我；可是，他沒有什麼可以給人的，只有給我一個好心眼。他說：「你別愁，我想辦法，介紹你進我們的學校。」他領我到學校的門口，讓我在門外等他的消息。

一面坡這個地方，我住了七八年，別墅似的火車站這一帶，我不常來，只有從前春秋結隊旅行的時候，來過幾趟。每趟，都沒玩够，就回去了。今天，我又來了，却什麼也不想玩，只是愛看這個學校，這所杏黃色的大樓；只是愛聽這樓裏的鈴噹聲。這聲音向我招呼：「你往這裏來！」可是，果里出來說了聲：「不行！」一個天地，給了我兩個感覺：剛才那麼明，此刻這麼暗了。我哭起來，果里也陪我掉眼淚。直到放學了，我還

沒哭完，他的眼淚也沒掉完。蘇聯學生們圍着看，有一個女教師對着果里談。我不大會俄國話，果里用中國話翻譯，告訴我：「因為你不是蘇聯人，又不是中東鐵路中國員工的子弟，不能收你。她讓我勸你走吧。」我似乎本能地問：「我往哪去？」女教師翻來覆去地解釋和勸說，末了跟着一句：「好孩子，你別哭了，走吧。」我想來想去，想不出別的話，總是自言自語地說這麼一句：「我往哪去？」時間太久了，圍着的人們都回家了，只剩下我們三個人。結果，女教師說：

「你跟我走！」

她手拉着我的手，身後跟着果里，我們走在蜿蜒河邊的小路，誰也沒說一句話。路靜，人也靜，耳旁只有流過沙石的河流聲，飛過天空的雁羣聲，走過落葉的脚步聲。這脚步声，就是一個聲。誰也分不出來，那是誰的聲。誰也分不出來，哪是女教師的，哪是果里的，哪是我的。誰也分不出來，哪是蘇聯人的，哪是朝鮮人的，哪是中國人的。總之，一條路上的一種脚步声。我回頭看了一下果里，他真有「捨命陪君子」的氣概。我再看看拉着我的女教師。她有二十五歲以上，三十歲以下的樣子。她的眼睛，真像海一樣的深，一樣的藍，一樣的水水冷冷。她的頭髮，真像金絲一樣，一樣粗，一樣柔，一樣黃，一樣的光光亮亮。她的手，真像太陽一樣，一樣熱而有力，柔而有情，一樣偉大

而不驕，有己而不私。我真感到了，跟她走着幸福的路，果里跟着，走着幸福的路；一切被壓迫的無路可走的人，跟着她，走着幸福的路。她，幸福的引路人。當我們到了她的時候，天快黑了。她留我吃了晚飯，給我幾本蘇聯畫報——我第一次看見了列寧和斯大林。她抱住我的頭，親了再親，說：

「你這個中國孩子我收你做我的學生！」

我站起來，恭恭敬敬地給她行了個禮。可惜，我不慣於她那種斯拉夫民族表現的形——親她，再親她；在我，只能夠把她的手拉過來，貼在我的臉上。我說：

「謝謝你，我的女教師！」

此後，當面和背後一樣，我從不叫她的名字，只稱她「我的女教師」。現時和彼時一樣，我都不會寫詩，只是走進如此的詩境：

在我的祖國，

我無故鄉，我無親人。

我只是一個人，一個身，

無人想念我，也無我想念的人。

我的女教師，

給了我一匹千里駒，讓我向天下奔馳。

我的去處，遙遠而無止。

我的去處，任憑我的馬蹄子。

我不知道，我往哪去。

在我頭一天上學的時候，我說不出來自己怎樣高興，我就是糖，全身都是甜的。果里和我不在一班，他把我送到教室，他就走了。我一進門，全室譁然。都歡迎着，喊着：「中國同學，中國同學！」他們都從自己的座位上，跳起來，拍起手。有的摸摸我的頭髮，爲什麼那樣黑？有的瞧瞧我的鼻子，爲什麼那樣低？有的拍拍我的臉，爲什麼那樣瘦？他們使我感到兩國的孩子，却有一個親熱勁。只有一個小傢伙，也許由於挑皮，也許爲了好玩，他把我的帽子搶去，往門外一甩說：「你怎麼不留給掛衣室呢？」別的同學明白，我身上只穿一件小襖，本來無衣可掛，何況又是個新規矩。因此，一羣對他一個，吵吵鬧鬧，大家開起沒有主席主持的鬥爭會。

這時候，我的女教師挾着書本上課來了。她首先喊了一聲：「各歸原位！」然後又喊了一聲：「手往後背！」我學着別的同學，把手往後一背，挺起腰板來。我的女教師問過剛才一場吵鬧的經過之後，邁開大步，從講台走到搶我帽子那個同學的桌前，訓斥

地說：「哥里沙，你不够我的學生，你不够蘇聯的學生！」隨後，她用手指輕輕敲他的頭，又是罰，又是愛。這個被罰和被愛的哥里沙，似羞似嬌地笑了一下，把帽子找回來，並說：「請你原諒我！」我的女教師，似乎仍不滿意。她改了這一堂的課目，把文法課改成政治課。她不斷地提起列寧和斯大林的話，不斷地解釋這些話。當時，我這個無知的孩子，大部分聽不懂她的話，但我懂她講的意思：用今天的話說，不外是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。

從此，同學們再沒有一個人，要笑過我；而且，哥里沙對我，表現的更好。我常常從他們手裏接到糖和點心，鉛筆和練習簿，畫片和紀念性的小東西。只有，上文學課那次，我的女教師問我：「你知道高爾基嗎？」我答：「不知道。」「托爾斯泰呢？」「不知道。」「普希金呢？」「不知道。」大夥憋不住，突然笑出一陣聲來。可是，我的女教師做個制止的樣子——用手把嘴一堵，笑的人們，笑了半截，就把笑聲憋回去。不怪他們，我只能責備自己的無知無識，只能責備中國教育的無知無識。不然，爲什麼，連這樣有名的文學家都不知道呢？縱然，沒有讀過他們的書，爲什麼連他們的名字都沒聽過呢？下課以後，我的女教師安慰我說：

「無知並非罪惡，不學才是羞恥。」她接着又說：「你願意學，你願意多學嗎？你

如果願意，我願用休息的時間教你。」

我的眼裏，有點潮濕；我從她身旁後退一步，恭恭敬敬地給她行了個禮。她抱着我，親了再親。

從這天起，她只有工作，再沒有休息了。在禮拜日、在例假日、在每天放學後和就寢前之間，一句話，她湊着一切屬於自己的時間，教我學習革命故事、文學名著、星的神話、科學知識……。有時，我聽不懂，她就講一遍再一遍。有時，我太累了，她就領我逛小公園，林中走走，凳上坐坐；在我恢復精神以後，她繼續教我。爲了這個，有時，影響她吃飯，影響她睡覺，甚而差點影響她和一個人的親密的關係。用常識判斷，可以肯定那個人和她是愛人的關係，但不知是丈夫，還是未婚夫；我沒問過，她也沒說過。那次，是在禮拜天，我沒遵守規定的時間，去晚了。我還像往常一樣，一推門，就進了她的屋子。他倆坐在沙發上，笑咪咪地手握着手，正在談心。我一進來，就衝散他們兩個。因爲我這不懂事、不懂禮貌的孩子，冒昧地闖來，使那個人顯得有點不好意思，也有點不舒服。他一邊比劃，一邊對我說：「你是個學生！應該懂得這個規矩：在你進屋之前，應該敲敲門呀！」我的女教師打斷他的話，向我說：「他告訴你這個，是對的。不過，這是太小的事情，不懂得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」她轉過身，又向那個人

說：「這一點小事情，你怎麼都不能忍耐呢？你爲什麼氣憤地說話？你影響了我的工作，你欺負了我的好學生，你應該向他道歉。」那個人想了半天，老老實實地對她說一句「請你工作」，又對我說一句「對不起」，就走了。從此，我每次進屋，都先敲門；凡是碰着他在屋的時候，他還是照樣老老實實地對她說一句「請你工作」，又對我說一句「對不起」，就走了。我雖年幼，但我懂得這個人情。因而，我幾次對她說，請她休息幾天，並處理個人的事，但我都碰了釘子。我的女教師說：「個人事小。工作事大。」可是，有一次，她自動地對我說：「從今天起，三天不給你補習。」

我明白，十月革命節快到了，她要買列寧、斯大林的像，買花、買酒、買糖，和愛人歡慶這個節日。我想的，也對，也不對。像，是她自己畫的，花，是她自己在山上採的松枝，掛在家的少，掛在教室的多。糖和酒是她和愛人去買的，可不是他倆吃。在這個節日那天，她約了我們許多同學去吃的。他給我們講過十月革命的故事以後，又說：「沒有十月革命，你們沒有今天的幸福。沒有列寧斯大林，你們沒有今天的幸福。」她爲了我，特別多加了一句：「對你這個中國孩子也是一樣。」

我相信我的女教師，相信她的話。在她沒說這話的時候，在我學習的時候，在我滑冰、看電影、逛俱樂部的時候，我就懂得自己是怎樣的幸福；這個用不着思考，因爲從

不幸中過來的人，都懂得幸福。不過，這樣幸福的人，不一定透徹了解幸福的來歷。因此，我特別感激我的女教師，感激她的話。

可是，壞消息來了。在課堂裏，我聽到我的女教師說：蔣介石這個壞傢伙反共了，反蘇了。而且，我嗅到了反革命的空氣。有一天，我們學校裏，來了一個「參觀」的中國教育廳「督學」，走進我們教室的時候，一眼就看見我，問：「你是朝鮮人，還是中國人？」我答：「中國人。」「你既是中國人，怎麼在紅毛子學堂念書？」「你說呢？」「你這個小孩子，真搗蛋，我是問你，你說呀，怎麼在紅毛子學堂念書？」「我願意！」「願意的事，不一定是好事，你還是到中國學堂去吧。」「我不，我不！」「你不？國家有法律呀！」

這可惡的「法律」，退了我的學，奪去了我的幸福生活。

在我辭別的時候，我的女教師送我兩本書——通俗的共產主義讀本和「七人」編著的俄文文法。果里和我一樣，沒有送的東西，他送我一滴眼淚。哥里沙、劉波和別的同學們，沒有這個準備，送我一個「再見」，送我一個搖手的動作，送我一個留戀不捨的影子。他們還說了不少的話，我聽不清；其中，只有一句，不知是誰說的，特別響亮：

「你往哪去？」

我的女教師沒等我說話，她就代我回答了：

「他跟我走！」

她抱住我，親了又親。我蹣起腳尖，挺起腰背，伸起頸子，聳起我這少年的整個身子，我的眼睛，剛剛「搆」着她那低下來的將近中年的臉，我就用眼淚親了這位比母親還親的人。隨着，我又恭恭敬敬地給她行了個禮；拜別我的女教師，還有果里和所有的同學們。我走了，走遠了。我只是一個人，手裏拿着我的女教師送給我的兩本書。可是，我覺得，還是像從前一般一樣：果里跟着，我的女教師拉着我的手，領着我走。

北方冬天，天短；這時候，已經快黑了。一面坡，還沒有火車開進來的小火車站，格外冷清。路上，人少，風雪大。我不說話，就聽不到別人的聲音。還是路靜，人也靜，耳旁只有颯着雪花的風聲，飛着覓巢的雀鳥聲，走着雪路的腳步聲。這個腳步聲，就是一個聲。誰也分不出來那是誰的聲。誰也分不出來，哪是女教師的，哪是果里的，哪是我的。誰也分不出來，哪是蘇聯人的，哪是朝鮮人的，哪是中國人的。總之，一條路上的一種腳步聲。我又回頭看看果里，他仍有「捨命陪君子」的氣概。我再看看拉着我的——我的女教師。她的眼睛，仍像海一樣的深，一樣的藍，一樣的水水泠泠。她的頭髮，仍像金絲一樣，一樣粗，一樣柔，一樣黃，一樣的光光亮亮。她的手，仍像太陽

一樣，一樣的熱而有力，柔而有情，一樣的有己而不私，偉大而不驕。我照舊感到了，我跟着她，走幸福的路。

我的女教師，你走吧；你這個學生，一直跟着你走，永遠跟着你走。不管你走得多遠——是海外，還是天邊；也不管你的學生受了什麼害——是斷了腿，還是瞎了眼，總能够爬得動，摸得着，總能够跟得上。你的學生，跟着你，已經走了這些年；而且，跟着你，將走無數年。

當面和背後一樣，我從不叫她的名字，只稱她「我的女教師」。現時和彼時一樣，我都不會寫詩，只是走進如此的詩境：

在我的祖國，

我有故鄉，我有親人。

我不是一個人，一個身，

有人想念我，也有我想念的人。

我的女教師，

給了我一匹千里駒，讓我奔到聖地。

這個聖地，光輝而美麗。